

巨变

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

(匈牙利)博兰尼著 黄树民译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橋譯叢 6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在這本已被廣泛公認為社會學思想中的經典之作中，博蘭尼的主要關切是：造成十九世紀西方文明破滅的起因。博蘭尼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勾勒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要求與民族國家內部社會福利的追求兩者之間的衝突，換言之，他以自由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過程來解釋自律市場社會的建立和其後的破滅，此即十九世紀西方文明的崩潰，而這一崩潰是於「社會爲了避免被自律性市場之行動滅絕而採取的」自我保護措施。本書這一主題是博蘭尼一生思想的總結。



新橋譯叢 6

博蘭尼著

中譯

NT\$ 400

新橋譯叢 6

鉅變：

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博蘭尼著

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譯



吳氏基金會

arl Polanyi, 1886-
牙利學者，曾任教於
、倫敦大學，二次大戰
哥倫比亞大學。
，他的重要著作尚有：
l Markets in the Early
1957), *Dahomey and*
Trade (1966), 以及
, Archaic, and
conomies (1968)。

康 樂 主 編 新 橋 譯 叢



新橋譯叢

6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著者／博蘭尼

譯者／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

總主編／康樂

編輯委員
石守謙・吳乃德・梁其姿
／章英華・張彬村・黃應貴
葉新雲・錢永祥

責任編輯／陳忠信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7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392-3707

傳真／3410760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05)227-3193

總策劃／吳東昇

策劃／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電話／(02)507-2606

電腦排版／正豐電腦排版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35巷7弄1號2樓

電話／(02)741-4749

印刷／弘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782號6樓之6

電話／(02)396-2264

1989(民78)年1月1日 遠流一版
(印數1~200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售價40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橋譯叢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6

作者／博蘭尼

譯者／黃樹民

石佳音

廖立文

校訂／陳忠信

吳乃德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 Press, 1957)

總序

這一套《新橋譯叢》是在臺灣新光吳氏基金會獨力支持下進行編譯的。其範圍廣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幾個最重要的部門，包括哲學、思想史、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我細審本叢書的書目和編譯計劃，發現其中有三點特色，值得介紹給讀者：

第一、選擇的精審 這裏所選的書籍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學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如韋伯(M. Weber, 1864—1920)和涂爾幹(E. Durkheim, 1858-1916)的社會學著作。經典著作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作者雖已是幾十年甚至百年以前的人物，但是他們所建立的典範和著作的豐富內涵仍然繼續在散發著光芒，對今天的讀者還有深刻的啓示作用。第二類是影響深遠，而且也在逐漸取得經典地位的當代著作，如紀爾茲(C. Geertz)的《文化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孔恩(T.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等。這些作品是注意今天西方思想和學術之發展動向的中國人所不能不讀的。第三類是深入淺出的綜合性著作，如帕森斯(T. Parsons)的《社會演進》(*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契波拉(Carlo M. Cipolla)主編的《歐洲經濟史論叢》(*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這些書的作者都是本行中的傑出學人，他們鉤玄提要式的敘述則可以對讀者有指引的功用。

第二、編譯的慎重 各書的編譯都有一篇詳盡的導言，說明這部

書的價值和它在本行中的歷史脈絡，在必要的地方，譯者並加上註釋，使讀者可以不必依靠任何參考工具即能完整地瞭解全書的意義。

第三、譯者的出色當行 每一部專門著作都是由本行中受有嚴格訓練的學人翻譯的。所以譯者對原著的基本理解沒有偏差的危險，對專技名詞的中譯也能夠斟酌盡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譯者全是年輕一代的學人。這一事實充分地顯示了中國在吸收西方學術方面的新希望。

中國需要有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瞭解西方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這個道理已毋需乎再有所申說了。瞭解之道必自信、達、雅的翻譯著手，這也早已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了。民國以來，先後曾有不少次的大規模的譯書計劃，如商務印書館的編譯研究所、國立編譯館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都曾作過重要的貢獻。但是由於戰亂的緣故，往往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像本叢書這樣有眼光、有組織、有能力的翻譯計劃，是近數十年來所少見的。我十分佩服新光吳氏基金會的深心和魄力，也十分欣賞《新橋叢書》編輯委員會的熱忱和努力。我希望這套叢書的翻譯只是一個新的開始，從初編、二編、三編，不斷地繼續下去。持之以恆，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一定會從翻譯進入創造的階段。是為序。

余英時

1984年9月5日

目 錄

總 序.....	余英時.....
導 論 超越唯經濟論的謬誤： 卡爾·博蘭尼的整體性社會科學.....	1
F. Block and M. R. Somers	

第一篇 國際組織

第 一 章 百年和平	59
第 二 章 保守的二〇年代，革命的三〇年代	81

第二篇 市場經濟的興衰

第一卷 撒旦的磨坊

第 三 章 居住環境對進步.....	99
第 四 章 社會與經濟制度.....	111
第 五 章 市場制度的演進.....	129

第六章	自律性市場及虛構的商品： 勞力、土地與貨幣	145
第七章	一七九五年的史賓翰連法案	157
第八章	前提與結果	169
第九章	貧窮與烏托邦	191
第十章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發現	203

第二卷 社會的自我保護

第十一章	人、自然與生產組織	227
第十二章	自由主義的誕生	233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的誕生（續）：階級利益與社會變遷	255
第十四章	市場與人	271
第十五章	市場與自然	291
第十六章	市場與生產組織	309
第十七章	自律性市場的損壞	321
第十八章	使國際經濟瓦解的壓力	331

第三篇 進行中的轉變

第十九章	民衆的政府與市場經濟	347
第二十章	社會變遷之齒輪中的歷史	365
第二十一章	在錯綜複雜之社會中的自由	383

資料來源註釋

1. 霸權均勢	395
2. 百年和平	402
3. 黃金線的斷裂	404
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勢力消長	405
5. 金融與和平	407
6. 「社會與經濟制度」參考資料選輯	408
7. 「市場制度的演進」參考資料選輯	415
8. 有關史賓翰連的文獻	423
9. 史賓翰連與維也納	433
10. 爲何不選擇惠特布雷德議案	436
11. 迪茲雷利的“兩個國家”和有色人種問題	438
12. 補充說明：濟貧法與勞動組織	443
一般索引	457
作者索引	471

導 論

超越唯經濟論的謬誤：

卡爾·博蘭尼的整體性社會科學*

Fred Block

合 著

Margaret R. Somers

石 佳 音

譯

* 由於許多人提供我們有關博蘭尼生平 and 匈牙利歷史的知識，使我們得以避免嚴重的錯誤。這些人包括：Istvan Eorsi, Gyorgy Litvan, Gyorgy Markus, Gabor Vermes, 和 Hans Zeisel, Eva Zeisel。此外，有許多人閱讀了本文的初稿並提出寶貴的意見，他們是：Giovanni Arrighi, Daniel Bell, George Dalton, Larry Hirschhorn, E. J. Hobsbawm, Peter Lange, Anthony Leeds, Gyorgy Markus, Larry Miller, John Myles, Harry Pearson 和 Theda Skocpol。由於我們並未完全遵照他們的建議，因此我們仍須對其餘的缺失負責。

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的著作是第一次大戰以來對社會科學最重要也最具原創性的貢獻之一。尤其是他的《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以下簡稱《鉅變》）^①一書，現已被廣泛公認為社會學思想中的經典之作。雖然博氏曾受到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重要的社會學思想家的影響，他的著作却很難歸類於任何主要的社會科學傳統之中。在《鉅變》中，到處可見其對馬克斯、韋伯、涂爾幹和其他古典思想家的回應，可是博蘭尼並非任何一位理論家的嫡傳信徒。事實上，在受到博蘭尼影響最大的人類學中，他的獨特貢獻，是他在經濟人類學領域裏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博蘭尼典範”（Polanyian paradigm），這個典範同時抵觸了馬克斯主義和實質論者（substantivist）的傳統^②。

耐人尋味的是，博蘭尼的典範或傳統無法安置於他的作品所涉及的其他主要學科中，如歷史、經濟學和社會學。雖然他的觀念曾影響到這些學科中的某些次團體，但是却沒有人嘗試將博蘭尼的研究方法使用在這些學科中。而且，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幾乎沒有任何討論博蘭尼的第二手文獻出現。然而近幾年來，在這些

① 最早出版於1944年，本文所引用的則是 Beacon Press 的 1957年版。以下簡稱“Transformation”。

② 例如，參看 George Dalton 和 Jasper Kocke, “The Work of the Polanyi Group: Past, Present, and Future”，這是1981年4月在印地安那大學經濟人類學討論會上提出的論文；以及 S. C. Humphries, “History, Economics and Anthropology: The Work of Karl Polanyi”, *History and Theory* 8(2)(1969):165-212。

學科中，博蘭尼的影響力有了明顯的復甦跡象；他的作品更常被引用，有關的第二手文獻的數量也在增加中^③。人們對博蘭尼再度發生興趣的理由並不難理解：《鉅變》一書及博氏主要的理論關切，以某些獨特的方式，和當代知識界的感受發生了共鳴。

最重要的是，《鉅變》指出了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要求與民族國家內部社會福利的追求兩者之間的衝突。博蘭尼在其對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的討論中，分析了國際資本主義秩序和曾被歐洲勞工階級所爭取的民主與社會改革之間的互斥性。此一論證似乎直接針對現代人的關切而發，“正當化和累積”（legitimation and accumulation）之間的衝突、“正當性（legitimacy）的限制”和“民主的危機”等等，已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中心主題^④；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和民族國家內部的民主成就之間，似乎也有著矛盾。

此外，自由市場的理論在現代又大為復興。為了因應凱因斯學派經濟管理策略的明顯不當，有些經濟學者和政客重拾十九世紀對“市場魔力”的信仰，主張經濟問題可經由有系統地減縮政府的角色而解決。對那些懷疑這種主張的人，博蘭尼的著作成為一個重要的資源，因為他的作品即是在批判早期對自由市場所做的辯護。博蘭尼當年爭論的對象——海耶克（Hayek）和米塞斯（von Mises）——正是現代自由市場論者的思想偶像，而博氏對他們的批評可能是所有這類批評中最具駁斥力的。因為他清

③ 重要的第二手作品都列在書目之中。

④ 在 Alan Wolfe, *The Limits of Legitim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一書中，對這類文獻作了評介與引伸。

楚地指出了自律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s）這個思想的基本錯誤和矛盾。

最後，對於當代受到馬克斯主義傳統的影響並企圖超越其限制的那些具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博氏的作品也具有甚大的吸引力。博蘭尼探尋一個獨特的理論及政治立場——一種非馬克斯主義式的社會主義，它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對立，以及對個人自由的要求都毫不妥協。雖然窮其一生，他一直是孤獨的，他却預見了許多現代馬克斯主義者和後馬克斯主義者的圈子中爭論不休的中心主題。最重要的是，博蘭尼意識到了馬克斯主義的重大錯誤，就是“唯經濟論的謬誤”（economistic fallacy）——亦即：賦予經濟以一個較諸人類行為的所有其他領域更為優越之分析的與歷史的地位。

在本文中，我們將詳細討論博蘭尼之當代關聯中的這幾個層面。但是，我們的主要關切是顯示，博蘭尼的作品在比較與歷史分析中的重要性。這兩方面的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博氏作品的契合當代關懷，這個事實也使我们迫切地想知道，他如何就他提出的問題尋求歷史的答案。但在做這個工作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知道博蘭尼思考活動的環境，並且列出《鉅變》的基本論證。

博蘭尼的一生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博蘭尼的完整傳記，這個工作自然是值得最高明的思想史家來努力。博氏的一生跨越五個國家，他以三種語文寫作，而且積極參與政治事件，從第一次大戰前匈牙利的政治改革直到六〇年代北美洲的和平運動等。他與他的妻子

伊樂納·杜清絲加(Ilona Duczynska)的私人交遊圈涵蓋了從歐洲共產主義古典時期的重要人物直到活躍於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的匈牙利異議知識份子。總而言之，如果要把影響博氏的，或受博氏影響的人物與事件一一指出，那將需要極大的篇幅，並且也包括了二十世紀許多重要的事件和觀念。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對博蘭尼的生平略做介紹應已足夠^⑤。他在1886年出生於匈牙利的一個顯赫的家庭。他的弟弟麥可·博蘭尼(Michael Polanyi)，最初以科學家而後則以哲學家聞名國際。他們的父親是一個匈牙利籍的猶太人，但後來改信基督教，並以建築鐵路而致富。不過他却在本世紀初失去了他的財富。博蘭尼的俄籍母親是一個堅強的知識分子，她將她的家變成一個文化沙龍。這個沙龍是戰前布達佩斯的知識中心。早在學生時代，卡爾就成為一個稱為“加利略學圈”(Galileo Circle)的團體中的活躍份子。這個團體的成員深信社會科學和科學計劃的解放潛力足以對抗「教權主義、腐化、特權階級、官僚組織——對抗在這個半封建國家裏無時無地不在的混亂狀態」。^⑥

⑤ 其生平資料是分別採自 Lee Congdon, "Karl Polanyi in Hungary, 1900-191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1 (1976): 167-83; Ilona Duczynska, "Karl Polanyi: Notes on His Life," in Karl Polanyi, *The Livelihood of M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Kari Levitt, "Karl Polanyi and Co-Existence," *Co-Existence* 2 (nov. 1964): 113-21; Hans Zeisel, "Karl Polanyi,"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以及 G. Markus, Hans and Eva Zeisel, G. Litvan 的私人通信。在 Peter Drucker,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中討論博蘭尼的一章雖然就有趣味，可是在許多方面並不正確。

⑥ Duczynska, "Karl Polanyi," p. xi.

博蘭尼的思想可追溯到1908年到1918年間匈牙利歷史的形成期。當時，由於奧匈帝國的停滯並最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忍野蠻，使得這個世代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趨於激進。博蘭尼便是其中的典型；雖然基於對勞工階級深刻的同情，使得他和其他加利略學圈中的成員參與了勞工教育計劃，可是他並未傾向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黨人之所以不具吸引力，是因為他們堅持第二國際的決定論馬克斯主義，這使他們相對地謹慎與保守。而且，社會主義黨人也不願支持匈牙利農民路線；儘管農民構成一龐大人口，他們却以幾句有關農村生活之愚頑性的廢話打發了農民問題。

特別是，博蘭尼激烈地反對第二國際關於進步之不可避免的信念；進步被視為早已註定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對他以及其他同代的人而言，最重要的觀念是：進步只能經由基於道德原則之有意識的人類行為而獲致。博氏在他為被年輕一代視為匈牙利民族重生希望之象徵的詩人艾迪(Endre Ady)所做的追悼演說中，把他和社會主義黨人間觀點的對比做了簡明的表達：「真理是這樣的：『雖然有，而非因為有，地心引力，鳥兒還是往上飛翔』。同樣的，『雖然有，而非因為有，物質利益，社會仍然攀向體現更高遠理想的階段』。」^⑦

就在他說了這些話之後幾個月，匈牙利之重生的希望就破滅了。隨著一次大戰的結束，政權由帝國手中轉移到卡洛利(Károlyi)政府手中。這是一個由社會主義黨人支配的聯合政府。當時博蘭尼和以奧斯卡·雅斯契(Oscar Jaszi)為首並且參加

⑦ 轉引自 Congdon, "Karl Polanyi in Hungary," p. 179.

聯合政府的激進黨合作。但是由於外來的壓力與內部的不和阻止了有效的行動，因此他和其他改革者的希望終一無所成。對這種政治困局的不滿使許多人投向新成立的匈牙利共產黨，而該黨也吸收了許多激進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來自左派的壓力使得大多數社會主義黨人加入共產黨而建立了由貝拉·孔（Béla Kun）領導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但是由於未獲蘇聯支持，貝拉·孔政權在內外交逼下解體，而由右派上台。

雖然博氏最初同情匈牙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但他在貝拉·孔仍然掌權時突然離去前往維也納。這顯示他已預知了迫在眉睫的災難。此後除了在晚年訪問匈牙利一次以外，他再也沒有回去過。在維也納期間，他擔任《奧地利經濟學人》的記者，這使他能夠就近研究二〇年代紛擾的政治與經濟事件。在維也納，他遇見了他的妻子伊樂納·杜清絲加。她曾是貝拉·孔政權中的活躍參與者。在繼革命政權之瓦解而興起的白色恐怖之後，她被迫逃亡。

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維也納的政局開始右傾，博蘭尼也移居英國。他在那裏終於找到一個勞工教育的工作。在英國，他參與了基督教社會黨人和教友派的團體，並且和他們合著一本書：《基督教與社會革命》（*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他為這本書中所寫的文章〈法西斯主義的本質〉（*The Essence of Fascism*），預告了《鉅變》一書中的某些論點：在組合主義的法西斯國家中，人類被貶抑成一項產品。1940年，博蘭尼被突發的戰事困在美國。後來在本寧頓鎮（Bennington）

他尋得一教書的工作。在那裏，他提煉他的思想而寫下《鉅變》一書。戰後，哥倫比亞大學請他教授經濟史，直到1953年他退休並移居加拿大和他的妻子會合。伊樂納因麥卡錫主義所迫無法住在美國，而他早定居於此。

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加拿大的那幾年，博蘭尼的研究方向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轉到古代和原始的經濟。1957年，他出版《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一書，這是他在哥大的一項合作研究計劃的成果。此後除了一些論文，博氏其餘的作品都在他於1964年去世之後才出版。一篇題為〈達荷美與奴隸買賣〉（*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的專論出版於1966年。在1968年，喬治·達爾頓（George Dalton）將他的一些已發表的論文、三本著作中的某些篇章、和一些未出版的資料編輯成一本書：《原始的、古代的、與現代的經濟》（*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最後，哈利·皮爾森（Harry Pearson）於1974年出版了博氏一份未完成的手稿：《人的生計》（*The Livelihood of Man*）。其中包括博氏之社會理論與經濟理論的一般性資料以及一篇對古希臘的廣泛分析。

博蘭尼對原始和古代經濟的興趣直接來自他對十九世紀市場社會的分析。在《鉅變》中，他試圖證實在資本主義興起前，市場只扮演著從屬的角色。他並且主張：前此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對古代社會的研究，都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就是用得自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去解釋市場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角色。雖然他嚴厲地批判由市場支配的社會，但他却無意製造一個重返前工業

(preindustrial) 社會之夢幻；他所關切的是構思並實現一種能調和科技與人性需求、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社會制度。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後不久，他們夫婦編輯了一本罕為人知的匈牙利詩人的作品集：《犁與筆》(*The Plough and the Pen*)，在其中他曾重申此一信念。而此一信念也在他畢生最後一個計劃中再度顯現，那就是他發起成立一份社會主義刊物《共存》(*Co-Existence*)。此一計劃耗費了他最後幾年的許多精力。該刊第一期的校樣完成於他去世的那一天。

《鉅變》

雖然博蘭尼的人類學研究和古典研究對後來的學術界無疑有更大的影響力，但《鉅變》仍然是他的主要成就。這是他唯一成書的手稿，而且在其中發展了所有日後著作繼續探討的主題。有如為了使一個學者與其如此不尋常的經歷相匹配，博蘭尼是在其學術生涯的開始，而非結束時，寫出了他思想的總結。其中囊括了他一生工作的所有主題。因此，我們將分析集中於《鉅變》是合宜的。

博氏之寫《鉅變》這一本書，是一項有意識的政治參與；他希望藉此影響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法西斯主義與這次大戰導致了“我們熟知之文明”的瓦解。但是這一場大災難是在歷史的行動者背後發生的，而且不為其所理解。由於人們並不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因此我們也就沒有理由相信，人們在將來可以避免野蠻和戰爭。雖然市場的缺陷在歐陸造成了最悲劇性的破壞，但博蘭尼相信造成這次文明毀滅的長期性因素必須在工業革命的發源

地進行分析，那就是英國^⑤。博蘭尼希望藉著闡明法西斯主義和二次大戰皆根源於自律性市場的興起，而能向戰後的世界指出通往更合乎人性的和更理性的結構之途。這個發展性的計劃構成了他整個研究途徑。

博氏對市場社會的激烈憎恨和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期望，乃是《鉅變》這項分析工作之驅力。可是他並無意只引伸及修飾社會主義傳統中的主要論證，無論是共產黨左派的或是社會民主黨右派的。他的思想和這兩方面的傳統都有深邃的差異。相反的，他企圖從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重建一套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式分析。這使他重新分析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並且重新利用馬克斯之前的理論家如亞里斯多德、黑格爾、歐文等的理論。博蘭尼重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式批判，他從事這項工作的胆識與原創性，使他的著作有了持久不衰的力量。

博蘭尼之研究途徑的獨特性，可從《鉅變》的最後幾頁明顯看出來，在那裏他寫道：

三樣東西構成了西方人的意識：對死亡的認識、對自由的認識，以及對社會的認識。第一者，按照猶太人的傳說，揭示於舊約的故事中。第二項者，則是藉新約所記載之耶穌教誨如何發掘個人的特異性，而向西方人揭示者。第三者則是因

^⑤ 他的妻子寫道：「在一生中，如能在某處尋得其基於道德的神聖憎恨之根源，可稱人的最佳殊遇。這在博蘭尼是發生於英國。後來在美國的時候，這股恨意只不過繼續增強。他的恨意直指市場社會及其後果，因為它剷除了人的形態。」Duczynska, "Karl Polanyi", p.xiv.

我們生活於工業社會而向我們揭示者。^⑨

在任何情況中，對知識的了解與接受都成為追求人類自由的基礎。尤其，「不加抱怨的接受社會現實，將賦與人類不撓的勇氣與力量來除去所有可以除去的不義和束縛」^⑩。總而言之，有些人以為一次革命性的轉變可使政治權力和社會衝突的問題自動消失；另有些人則認為以激進的行動來創造更美好的社會，結果一定是徒勞無功。博蘭尼希望在前者的烏托邦思想和後者的灰心喪志之間尋出第三條路。

《鉅變》是對市場社會之興衰的說明。這過程包括兩次重大的轉變：由重商主義而興起的市場社會，以及因市場社會崩潰而導致的法西斯主義與世界大戰。博蘭尼的政治目的使他對後者的分析比對前者的分析有更為完整的發展，但兩者皆有缺漏之處。不過，他論證的這兩部份都值得注意，尤其是他對其他與之對立的解釋之批評，以及他對大規模歷史變遷的了解。

博蘭尼一開始即強調：英國之所以由商業化的重商主義社會轉變為市場社會，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進化過程的結果。他駁斥了如下的流行看法，即視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出現為自中世紀以來市場活動持續擴張的結果。相反的，博氏指出：雖然從十六世紀起，市場即有相當數量並具重要性，但是，並無跡象顯示市場終將宰制社會。相反地，國家對市場的管理限制了它的影響。在重商主義之下，無論是遠程貿易或地區性的買賣都被國家

⑨本書，頁391。

⑩本書，頁392。

或市民所管理，後者甚且強烈反對全國性市場的出現。^⑪

博氏的論點是與為人熟悉的進化觀對立的，他認為，全國性市場的出現並非地區性或遠程貿易逐漸擴張的結果，而是由於國家有計劃的重商主義政策^⑫。全國性市場的造成只是某些建國策略的副產品；在這些策略中，經濟發展被視為國力的基礎。可是即使是全國性市場的出現，仍不足以促成市場社會的充分發展。市場社會的充份發展，有賴於其他方面的變革：土地、貨幣和勞力的商品化。博蘭尼在討論英國的史賓翰連法案(Speenhamland Act)中，分析了勞力的商品化。^⑬

在十八世紀的最後廿五年，英國農村突然為紛擾、急劇增加之貧民所苦。地主階級們深切恐懼貧民的反叛性，但他們同時也關心由於新興農鄉——工業村落以較高薪資吸引貧窮村民——而造成之鄉村人口減少的趨勢。雖然當時人們並不了解，但貧民其實是由於英國世界貿易在範圍上的顯著擴張，以及無常性的顯著增加。這項無常性在鄉下特別容易被強烈地感受到，因為在農村

⑪見本書，頁415-423。也與此有關的是 Ira Katznelson, "Community,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Class," *Politics & Society* 9(2) (1979): 203-37.

⑫博蘭尼在強調了中世紀城鎮是封建制度的組成部份，而非與其對立時，他預見了許多當代馬克斯主義者對轉型問題的討論。特別參見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以及 John Merrington,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93 (Sep.-Oct. 1975) 71-92. 但是，我們也須承認博蘭尼並未就封建制度轉型至資本主義的問題提出令人滿意的說明，因為他只略微觸及國家政策、資本家利益和生產組織的變遷三者間的相互關聯。

⑬本書，第七章。

中，農村失業與鄉鎮職業的誤置（dislocation）同時並存。而且，當經濟衰退減少了商業與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之後，這些貧苦勞工就只好回到其鄉下教區賴救濟而生活。由於家庭農地已被全面廢止，使得失業者的保險屏障也不復存在。因此即使那些受僱於農村工業鄉鎮的人也只能步向貧民的命運而別無保障。在博蘭尼看來，這些貧民只是即將隨著工業革命與市場社會的來臨而爆發之誤置的明顯徵兆而已。但這樣的結果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僅是貿易與市場的擴張並不會自動促發質變而跳躍至市場社會。只有有意識的政治干預行動才會造成這個歷史性的獨特事件。博蘭尼將討論的焦點集中於史賓翰連法，便是基於這個分析的視野。

1795年，制定於1662年的住居法（Act of Settlement）部份條文被廢止，目的在使勞工不再受限於只能在家鄉的教區尋找工作。由於受到工業需求的壓力，“教區農奴制”（parish serfdom）被廢除了。勞工因而可以自由遷徙，這促成了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之勞力市場的出現。但是，就在這同一年，一個新的濟貧制度建立了，這就是史賓翰連法。它是一項反映“生存權”（right to live）原則的制度。它以麵包的現行售價為標準對工資予以補助；此一補助同時也附有家庭津貼。它並且是以救濟院外的貧民救助方式而發給，而非將貧民收容進習藝所（workhouse）。它的目的是要在史賓翰連法所施行的鄉間地區造成就業機會，同時防止貧民四處流浪。因此，救助只限於當地的教區¹⁵。這項法律的制定乃是對下列兩項問題的回應：一是貧民的結構性問題；另一則是為了因應第一次政治干預行動——住居法的廢止，因它妨礙了除去通往自由勞動市場的障礙。

史賓翰連法成功地維持了地主階級的地方政治權力，同時也成功地經由阻止勞工的解脫而延緩了成熟之資本主義的產生。但是對貧民和多數的農村佃農而言，其結果却是破壞性的。薪資陡降至糊口的水平之下。因為，既然教區有義務要維護區內之勞工於僅可維生的生活，僱主就無意於付出相當水準的薪資。身為政治統治者的鄉紳們擔任了仁慈施捨者的角色，因為支付勞工津貼的稅款全來自不具有法律所有權的地主或農村中產階級的荷包。鄉紳們因此由集結成羣的游動勞工中獲益。

雖然史賓翰連法被認為是支助貧民的制度，但實際上却便宜了僱主，因為此一法案是以公帑來補貼他們的勞力成本。在某些地區，只有那些列於救助名單上的人才可能找到工作。而那些試圖自力更生的人則難以找到工作。結果在貧民身上廣泛造成道德的墮落。因為即使是有工作能力的勞工窮人也變得與貧民無所區別——他們都被迫仰賴救濟。這項福利措施摧毀了工作意願，同時也剝奪了英國勞工的尊嚴。它試圖將保護主義的“生存權”與勞動市場的薪資制度這兩項無法共存運作的東西，融和在同一個制度之內。這兩股互相衝突的驅力，預示了整個十九世紀的發展。¹⁶

在博蘭尼對史賓翰連法的討論中，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這種互

¹⁵ 在歷史學者之間，對於此一津貼制度所實施的地理區域範圍有廣泛的爭論。

John and Barbara Hammond 認為史賓翰連制度曾廣泛地為各地方所採用；他們顯然大大影響了博蘭尼。見 John and Barbara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vols. 1 and 2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48; orig. 1911)。對於各種對立論點的討論和評估，參見：J. D. Marshall, *The Old Poor Law*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68)一書。

斥的二元性。他所批評的，並非“保護”本身，而是此一特殊制度的結構。不只薪資補助陰險地隱含壓低工資的效果，同樣嚴重的是1799年和1801年所通過的反合併法（anti-Combination Laws）。這些法律使工人不能在體制內經由真正的工會制度從事集體對抗及談判以獲取權力。雖然保護主義的原則是要保護勞工免於市場的危害，但薪資制度却迫使他們靠出賣勞力而謀生，並且由於薪資補助制度使得勞工無從確知其勞力的價值。於是，一個新的僱主階級產生了，但是並沒有足以構成一個相應階級的受僱階級出現。對工會不利的法律是阻止勞工得以爭取提高受僱者薪資的最後一個結構性的障礙。

史賓翰連法廢止於1834年，博蘭尼認為這是新興的工業中產階級於1832年獲得之政治勝利的結果。自那時起，他們武裝著新的立法權力，以及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科學法則”¹⁶。這次濟貧法改革案（Poor Law Reform）取消了對失業者的戶外救濟，而

¹⁶ 關於史賓翰連法所造成的影響，在歷史著作中也是廣受爭議的。例如，Mark Blaug 就主張這個法是要維持過剩之農村人口的合理設計。見其“The Myth of the Old Poor Law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 (1963): 151-84, 但 Eric Hobsbawm 和 George Rude, *Captain Swing*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9) 不同意此一觀點。另參看本書的資料來源註釋，頁435-9。

¹⁷ 在 Anthony Brundage, *The Making of the New Poor Law*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9) 和 “The English Poor Law of 1834 and the Cohesion of Agricultural Society”, *Agricultural History* 48 (July 1974): 405-17 中，有對新濟貧法（New Poor Law）的修正解釋，它視之為維護地主階級傳統權力的立法。D. C. Moore, *The Politics of Deference* (London: Harvester Press, 1976) 對1832年的改革法案也有類似的重新解釋。

強迫在鄉下流離失所的人們進入令人憎恨的貧民習藝所，使習藝所成為受人蔑視的工廠之外的唯一選擇。這就把作為商品的勞力充份制度化了，因為現在勞工只有出售自己的勞力才能生存下去。由於社會網絡（social net）的消失使得市場——而非國家——能讓薪資自行尋得其適當的水準，於是生存於薪資制度之外的權力已不復存在；工業資本終於到達真正上台的時刻。

可是博蘭尼並不浪漫；他不是要把史賓翰連法的“善”拿來與繼起之市場資本主義的“惡”做一對照。事實上，對於史賓翰連法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博蘭尼明顯地給予負面的評價，不管是史賓翰連法之廢止所造成之毀滅性的影響，強迫性的往都市移居，以及新濟貧法（New Poor Law）史無前例的“科學的冷酷”（scientific cruelty），兩面都是災害，他指控：「如果史賓翰連法意味著停滯的腐朽，那麼，現在的危險就是遺棄至死亡。」¹⁷

博蘭尼如此重視史賓翰法案這段歷史插曲，有幾個理由。首先，該法顯示了市場發展之非進化性與不連續性的本質。勞力市場的興起並非自動出現的——它必須藉著濟貧法改革案這項政治干預才能制度化。博蘭尼視十九世紀市場經濟為一項歷史的新生事物，並且對因之而來的意識型態之扭曲展開批判。對博蘭尼的論點而言，強調國家（state）在解放市場力量中所扮演的角色，無疑甚為重要。通往自由市場的道路是由繼續不斷的政治操縱所鋪設而成，不論國家是積極地參與廢除舊有的限制性法規，如史

¹⁷ 本書，頁165。

賓翰連法，或者是成立新的政治行政單位以助長新興市場經濟的生產要素，有如新濟貧法的行政機構。環繞著史賓翰連法這段歷史插曲的政治建構——它的制定，它的施行過程，以及它最終的廢止——都可以說明，所謂“自然的”自律市場，其本源是如何受助於政治力量。

其次，博蘭尼認為：史賓翰連法的經驗及其引起的爭辯奠定了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基本假定。當「經濟自由主義才開始具有十字軍般的熱忱，而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則變為一好戰的信條」^⑩時，濟貧法的改革便發生了。博蘭尼的目的是要顯示：塑造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經濟思想的一些基本假定，其實是來自此一已有一世紀之久的熱情。做到這一點之後，他才能證明那些假定在一開始就犯了基本的錯誤。為此，他必須回溯到史賓翰連法以及“自由主義信條” (*liberal creed*) 的誕生時期。對博蘭尼而言，沒有什麼比以下這三點更重要的了。一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普遍流行；二是，此一意識型態基本上是錯誤的；三是，它成了「解決我們文明之問題的主要障礙之一」。^⑪

為了使這一點有說服力，他也使用史賓翰連法案的例子來主張：由於意圖保護人類之勞力的制度安排，以及毫不顧及社會需求的薪資制度這兩者是互相抵觸的，因此試圖建立一個有利於勞工的自由市場是註定要失敗的。對博蘭尼而言，如果沒有因濟貧法改革案而造成之勞力的完全商品化，市場社會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勞力的商品化實是市場社會的典範 (*paradigm*)；而試圖

^⑩ 本書，頁235。

^⑪ Polanyi, *The Livelihood of Man*, p.xvii, 以下簡稱爲 *Livelihood*。

將人轉變為商品正是市場社會的核心要素，但也是其核心缺陷。其所以為核心缺陷，因為一旦市場社會制度化之後，一個強力的反運動也同時展開，後者旨在保護社會免於市場的侵害。正因勞力的商品化代表著一種對人類社會結構頗為基本的威脅，它因此也促發了一股無可抗拒的、旨在保護社會的反對壓力。博蘭尼認為，相對於企業家和國家之營建者們為建立市場社會而做的精緻計算，其反對運動是自發的、未經計劃的，而且是來自社會的每一部門，以對付市場所造成的破壞性後果^⑫。透過比較歷史的分析，他顯示了，雖然不同的政府在意識型態上有極大的差異，但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都經歷過一個時期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以及接踵而來的干涉主義立法時期：關於公共衛生、工廠條件、社會保險、工會結社、公共設施等等法案。這正反映出自由市場制度中工業發展的基本矛盾。博蘭尼以下面這一段話來描述市場社會和保護主義之反運動的對立主張：

其中之一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自律性的市場，受到商人階級的支持，而且使用自由放任和自由貿易為其手段；另一原則是社會保護的原則，目的是人類、自然、及生產組織的保護，受到最直接受市場制度所傷害

^⑫ 由於博蘭尼反對一項古典自由主義的普遍說法，因而激勵他特別強調地討論保護主義運動的無計劃性。該一說法可見 A. V. Dicey,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40; orig. 1905)，這一說法主張有一個“集體主義的陰謀”在暗中破壞自由市場。